

# 历史深处的忧患

## ——试析冰心之对日态度

李卓然\*

### 目 录

- 一. 引言
- 二. 思维模式的定型
- 三. 国耻家仇的化解
- 四. 文化成因的追溯
- 五. 结语

## 一. 引言

纵观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求新求变之路，每每在关键时刻都和东海之瀛的日本相撕缠；无论中国人是否愿意承认，事实上在近现代诸多“帝国主义国家”之中，日本对中国发展轨道（尤其是在紧要转折点上）的方向性影响极为巨大而深远，甚至可被视为在这一方面影响效应最大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和日本多有关联，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二十世纪的同行者”，冰心的创作生涯丰富多彩，不仅在国内交游广阔，而且和众多异邦及其知名人士都有交集；而日本无疑是冰心相交最深的一个国家，她的大半生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陆民间看待这种联系的视角往往对冰心原谅日本侵略史所展现出的博爱、宽容和高贵

---

\*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进行道德化解读，在众口一辞的褒扬声中将个体的谅解与民族的宽恕相互印证；而学界对于冰心之对日态度则并未有足够的关注，<sup>1)</sup>更鲜有研究者去尝试深入系统地发掘这幅完美的道德论证图景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矛盾，也尚无研究成果去尝试解释这种矛盾与国民性之间千丝万缕的深度关联。事实上，冰心对日本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变化发展过程可被视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中的一枚典型标本，极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而她和日本自其父辈就开始产生的一系列复杂联系，以及她各阶段人生经历中交汇融合的丰富东瀛元素，又使得她比同时代其他一般作家在这一点上具有更丰富的实践体验和更有力的发言权，以上都使得本文对这一题目的探究兼具典型意义与独特价值。本文将通过对冰心民国文学作品的分析找出其“官民分裂”的思维模式，并进一步探究这种思维是如何从根本上影响了冰心对日本的态度和看法，并作用于其后半生的创作立场与政治情感，从中发掘出宰制冰心思维而其又不自知的“潜逻辑”，以期对冰心思想的深化了解乃至中国国民性的更新有所裨益。对“官民分裂”思维模式的剖析和展开亦能让我们以管窥豹地审视一种埋藏在国民心理深处的情感惯性，并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中反复出现的某类事件的解释依据和思考导引。

## 二. 思维模式的定型

冰心以“问题小说”在民国文坛展露头角，其为文贴近生活和实际、关注普通百姓的遭遇和感受，此等着眼大众人生的创作取向在其文

1) 在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数据库中，在搜索框中选择“篇名”填入“冰心 (空格) 日本”，在所有“学术期刊”、“硕士和博士论文”、“会议”、“报纸”中并未发现专门研究冰心对日态度的有效搜索结果，搜索时间截止为2019年2月17日。

学生涯中始终如一。冰心创立的“爱的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下层人民的爱，对这样一种爱的推重贯穿了她写作的主脉。冰心尤其关注赤贫阶层的各色人等，她笔下那些着力描写、用心和其沟通的小人物大都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是受虐待的童养媳（《最后的安息》）、老实吃亏的无名兵丁（《一个不重要的兵丁》）、靠捡弹壳贴补家用的孩子（《三儿》）、在厨房跑堂的佣童（《超人》）等，而这类小人物所对应的社会上层，如负责命令指挥的军官、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生活优渥的大户少爷等在其作品中也都以一种反衬的形象出现。如要细致发掘冰心叙写底层和上层人物的特定模式，从她的民国作品中寻找线索和答案不啻为一脉务实的途径，尤其是其小说塑造人物暗含的框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在这些作品里面，各类人物角色于剧情中表达意义的方式上反复出现着温和而坚定的二元对立，例如贫穷/富有，弱勢/强权，底层/上层，高尚/鄙猥，往往代表正义、光明和希望的都是贫弱者（贫穷、无权、处于底层之人），而品行不端、身背罪责、终被感化的都是富阔者（富裕、有权、隶属上层之人）。总之，人物品行的好坏优劣往往可以从其身份（或者说阶级地位）上推导出来，在一种对于财富、权力、地位的反向歧视的叙述中，充满戏剧化反差的贫民和上层总是那么泾渭分明。

冰心在1931年创作的小说《分》就是一部按照这种模式撰写的典型作品。文中的“我”是产房里的一个新生婴儿，来自社会上层；和我一个产房的“小朋友”则是贫民的代表，出身屠户家庭。“我”和小朋友之间的反差在文中不断出现：前者金贵娇弱的躯体对比后者结实粗犷的身板，前者享用的奶粉和橘子汁对比后者裹腹的米汤和糕干，前者考究套装的新衣对比后者拆改补缀的旧袄，前者的专车接送对比后者的雪中徒步……虽然这样的比较是以“我”的富裕和小朋友的贫穷为基点的，但在价值的天平上冰心却明显地偏向于小朋友。如果说在物质的占有上“我”毫无疑问地多于小朋友；在精神上则是小朋友对“我”完胜。小朋友的一

系列表情不断地向“我”施以深切的同情，如“似轻似怜”的微笑着、“似怜悯又似鄙夷”地回应“我”说的话、不时地“安慰”我、分别时“脸上是凄傲的笑容”等。<sup>2)</sup>而“我”反馈和感受则是不断“默然”、“惭愧”、“栗然”。<sup>3)</sup>当小朋友这样对“我”陈说自己以后的梦想：“我大了，也学我父亲，宰猪，——不但宰猪，也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sup>4)</sup>“我”的反应是“静静的听着，到了这里赶紧闭上眼，不言语”，<sup>5)</sup>在之后反复思量这句狠话时“小手在裘底伸缩着，感出自己的渺小”。<sup>6)</sup>小说在“我”和小朋友分别时“我”羞惭的哭声中结束。冰心对于贫民（小朋友）的道德美化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上层（“我”）的道德羞愧，在她作品中贫民在道德上的天然优越性似乎是在暗示读者，那些上层多是为富不仁、为官不义、好吃懒做的剥削者，正是由于他们用“来路不正”的手段获取财势权位才导致了贫民的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因而后者的穷困应该由前者承担责任，造反（“宰那些猪一般的尽吃不做的人”）是合乎公义的行为。

这种对底层的圣化和对上层的矮化在冰心前期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影子，贫民的高尚可敬对应着上层的卑鄙可怜。穷困无依、目不识丁的贫民才是真理的拥有者，闪耀着尊贵的光芒；那些出身矜贵、收入优裕、受教良好的上层反而是最需要怜悯的，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手握资源，但论道德水准则在贫民面前低人一等。更为关键的是，上层无德和无良的行径是广大贫民艰辛生活的始作俑者，是社会不公不义的祸端。于是在贫民高尚品质的触动下，上层幡然悔悟，进而“低头认罪”，甘作被贫民教育的学生；理想化的贫民成为了神圣的导师，引领着上层改邪归正。我们可以将冰心的这种思维模式称之为“官民分裂”，其可用以下

2) 冰心著：《分》，《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312页，314页。

3) 同上，第309页，312页，314页。

4) 同上，第310-311页。

5) 同上，第311页。

6) 同上，第313页。

“三位一体”来概括：一.将人群划分为弱小、无权、善良之贫民和强大、有权、伪恶之上层的二元对立视角；二.贫民对上层天然地具有道德优越感和道义制高点；三.贫民可以通过道德感化、动情晓理来使上层悔过自新、自愿臣服。在《分》这篇作品中贫民事实上用话语把上层“感动”和“说服”了，令上层蒙生羞惭并进而生发出想成为贫民阶层一分子的强烈意愿，形成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性微弱的诡异逻辑。

正是因为“官民分裂”的思维模式在理论上预设了上层和贫民的二元划分，并用黑/白、邪恶/正义、奸伪/良善的标签赋予双方以鲜明的身份，就不难形成如下推理链条：首先认为这个世界由一小撮上层和绝大多数贫民组成；接着判定前者为奸邪恶人，后者为正人君子；然后，世间的灾难往往由恶人欺骗和蒙蔽善人所导致；最后，灾难的全部责任应由这一小撮邪恶的上层来承担。这样一整套说辞使得一向以成熟冷静著称的冰心也陷入了逻辑怪圈，这在其对日本的态度上得以充分的展现。

### 三. 国耻家仇的化解

首先谈冰心对于日本的感觉。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再也没有什么词比“国耻家仇”更为恰当的了。冰心的父亲谢葆璋17岁跟随严复应征清朝海军北上求学，后在北洋水师的四艘主力巡洋舰之一的“来远号”上担任驾驶二副（其它三艘主力战舰分别为“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并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战舰的枪炮官。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中国黄海决战，史称“大东沟之战”。战斗异常激烈，在“致远号”和“经远号”以及其它诸舰相继被击沉或围困的情况下，“来远号”与“靖远号”拼死抵抗日军4艘巡洋舰的疯狂围攻。“来远号”苦战多时，身中200余弹，尾炮失灵，弹药舱爆炸，全舰燃起烈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谢葆璋率领兵士奋力救火并将

其扑灭。之后“来远号”一直带伤作战至战斗结束。在这场战斗中，谢葆璋身边的战友(也是冰心母亲的侄子)被炮弹击穿腹部倒地牺牲，肠子被炸飞在烟筒上，停战后谢葆璋才从烟筒上把烤焦的肝肠撕下来塞回到战友的胸腔里入土安葬。次年2月5日夜，“来远号”在威海卫港被日军用鱼雷偷袭得手，谢葆璋在舰体即将爆炸之时跃入海中，死里逃生泅血海赤脚返回山东威海湾刘公岛。这段发生在父亲身上惊心动魄的故事给冰心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她坐海轮赴美留学途经东京游就馆（位于靖国神社内东北角的日军战争博物馆），看到展列的日军甲午战争缴获清军的战利品和周围墙壁上颂扬胜者的战争图画，“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sup>7)</sup>激愤之下竟控制不住昏坐在地。这个“甲午情结”贯穿了冰心的一生，冰心的小女儿吴青在2004年整理其遗物时，在一本杂志中发现了一个裁开的已用过的信封，背面是小说《甲午战争》的一段长约二百来字的开头。“晚年的冰心，一直想写这个题材，但一提起笔，感情便不能控制，大哭，甚至嚎啕大哭，文字不能成行，这个信封上便落满了泪痕。”<sup>8)</sup>她多次一想写这个题材就禁不住老泪纵横而完全不能下笔，边哭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sup>9)</sup>亲见其哭的舒乙曾这样形容：“那是一种真正的大哭，很吓人。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声泪俱下……来势极猛，像火山爆发……”<sup>10)</sup>当时已94岁高龄冰心竟因哭得无法起笔去写这部计划中的小说而生病入院。

正是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对于日本冰心很早就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思想。19岁的冰心参加了“五四”反日游行，她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也多有抗日思想的流露。在洛阳纸贵的《关于女人》文集集中的《我的奶

7) 冰心著：《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8) 王炳根著：《甲午战争》编者注，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9) 舒乙著：《冰心的豪恸大悲》，《意林》，2006年第20期，第57页。

10) 同上。

娘》一文里，她以第一人称记叙“我”的奶娘，“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sup>11)</sup>奶娘的丈夫就是受东洋领事的欺压而死的，临终时还高喊“打死日本人，打死东洋鬼”。<sup>12)</sup>奶娘希望“我”长大后“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sup>13)</sup>奶娘播下的抗日思想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田中发芽。直到“五四”运动“我”在游行队伍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仿佛我的奶娘在牵着我的手，和我一同走，和我一同喊似的”。<sup>14)</sup>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艰苦抗战更是让冰心对日本的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年年底，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冰心和丈夫吴文藻决定忍痛搬离他们在燕京大学的爱巢，从北平撤往西南大后方。冰心将许多珍贵而又无法随身携带的文本仔细打包好存留在燕大教学楼的阁楼上，其中包括吴文藻近二十年的日记、冰心自己留美三年的日记、冰心和吴文藻六年来的大量的通信、全国各地的无数小读者的来信、冰心的父母亲年轻时的通信及父亲在海上写给母亲的诗、还有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苏雪林、郑振铎、凌淑华、泰戈尔、伍尔夫等作家签名赠送的作品……可是当抗战结束后冰心返回燕大急切地想找回这些对于她而言无法替代的财富，却发现其早已被日本宪兵收走而不知所终，在那一刻冰心差点晕倒在地。<sup>15)</sup>谢葆璋在战争开始时已76岁，由于年事已高、病弱体虚无法离家避难。于是家人商量后决定，由冰心大弟谢为涵留下照顾老父。华北沦陷后，日军在当地建立傀儡政权，汉奸多次威逼利诱冰心大弟在“政府”中担任高官，大弟坚决不从。1940年7月谢葆璋在给大儿子留下“决不能屈服压迫”的遗言后一个月，便在忧国和思女的双重煎熬下溘然长逝于北平，远在陪都重庆的冰心连父亲的

11) 冰心著：《关于女人·我的奶娘》，《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34页。

12) 同上，第535页。

13) 同上，第536页。

14) 同上，第537页。

15) 王炳根著：《永远的爱心·冰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而冰心大弟在这之后和妻小为了避难四处奔波，最终积劳成疾，于1944年8月病逝，没能等到一年后日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USS Missouri）上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刻。冰心对于日本的民族情绪不仅仅是热血青年的激情迸发，而是一直延伸到她的整个人生历程，晚年的冰心对每一位拜访她的客人所使用的照相机都会如此盘问：“是日本的吗？那么多的钱都被他们赚去了，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发展民族的工业呢？”<sup>16)</sup>有时她竟会因为来客使用日本照相机而拒绝与其合影。

以上列举诸多事实足以证明冰心对于日本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而且冰心本身是个烈性子的人，童年经历幸福美满，性格也很健康，断没有受虐倾向，但是在“官民分裂”思维的引导下，她竟然看似完全地化解了这样的国耻家仇，足可反映思维逻辑力量之强大。那么，冰心究竟是如何化解的呢？

1946年11月吴文藻被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遂随夫到日本赴职，直到1951年由周恩来指挥中共地下党执行部署周密的特别行动，接送其全家经由香港秘密返回大陆。<sup>17)</sup>在这近五年期间，冰心和战后的日本各界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她除了中途回国出席“国民参政会”，一直都在日本生活和讲学，而且还在日本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于冰心二战结束后头几年的“外交时段”中，论述话题集中，对研究冰心的对日态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在其生前均未在国内转载，直到2009年经翻译整理后（因文章发表于日本刊物时已被译为日文，如今中文原文已散佚，故需重新翻译回中文）结集为《冰心佚文》出版。

16) 王炳根著：《永远的爱心·冰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17) 冰心归国后全家被安排在北京东单洋溢胡同的一间小房中，并对外保密达两年之久，直到她1953年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文章《归来以后》才重新公开露面。

接下来的论述就将援引这本佚文集中的一些材料。1946年冰心和两位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佐多稻子的座谈以《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为题发表于日本报纸《每日新闻》，其中冰心有一段谈话说：“前几天来了一位日本年轻作家，他说：‘作为日本人，这次战争使我们对日本惭愧不已。’但是我说：‘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参战的不是所有的日本人，而是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这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我们对日本的民众绝没有恨意，这种恨意只是针对一部分军阀。’”<sup>18)</sup>在1947年发表在上海《妇女》杂志的《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一文中，冰心称日本妇女和中国妇女一样“都是受压迫的”，冰心还说道：“我们对日本人民没有仇恨，我们只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为五十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欺侮是日本军阀所造成的罪孽。事实上，你们受军阀的压迫和残害比我们还厉害，比我们还可怜。因此，军阀是军阀，你们是你们。”<sup>19)</sup>（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原来在冰心的逻辑中，一小撮日本军阀和占大多数的日本人民是截然分开的两类群体，前者是蒙蔽百姓的、邪恶的、有罪的，后者则是被蒙蔽的、良善的、无辜的，而侵略战争则是由前者欺骗不明真相的后者而发动，因此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属于受害者。故在谈及日本的侵略时，冰心一直小心翼翼地使用“日本军阀”作为主语，将暴行的实施者严格限定在这“一小撮”人之内，也将所有的战争账都算在他们头上。而对于日本人民，冰心秉持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1947年冰心应东京自由学园创办人羽仁吉一及夫人羽仁元子的邀请访问学园，就中日各方面的话题与夫妇二人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她在这次对话中称：“我们这次来日本也是为了和完全不同于军人的正直的日本人交流，理解和同情、互相手牵手……”<sup>20)</sup>

18) 冰心著：《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19) 冰心著：《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20) 冰心著：《在世间追求和平与美》，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同属“我们”的群体范畴, 日本军阀则属于“他们”, 因而对于战争的愤恨应该投向“他们”而非“我们”, “我们所憎恨的是一个暴力的集团, 一个强权的主义, 我们所喜爱的是一般驯良和善心的人民”。<sup>21)</sup> 日本人民不仅不需要道歉, 相反还应得到同情和理解。冰心在谈话中称“这是中国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sup>22)</sup> 这在她1947年从日本回国出席“参政会”期间作介绍日本情况的演讲时得到了印证。冰心到过的有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等各大主要城市, 巡回演讲总计数十次。在经历过日军大屠杀的南京, 热心的听众们在演讲完毕后的提问环节虽然“提出成山成海的问题”,<sup>23)</sup> 但是“他们似乎事先商量好似的, 无论我去哪个会场, 这些问题居然一模一样”,<sup>24)</sup> 其中包括有关于日本青年战后活动的问题、日本妇女解放和自由权益的问题、日本言论自由的问题, 甚至还有围绕日本茶道和花道的问题。然而令冰心意外和惊讶的是, “本来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应该对日本战犯和赔偿问题等提出疑问或意见什么的, 然而有关这些问题几乎无人问津”。<sup>25)</sup> 看来中国民众遗忘苦痛的速度着实迅速, 似乎在战争刚结束后很大一部分人想的不是如何惩罚日本来获取应有的赔偿, 而是去了解 and 同情这个曾经的敌国。从听众们问出的那么多有关日本百姓民生福祉和权利保障的问题并急切地想知道答案, 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邻邦的热心关切, 对其民主进步的真诚祝福, 也足以证明中国人民的厚道和善良。冰心的《给日本学生的一封信》中也充满了这种对战后日本人民得以“当家作主”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187页。

21) 冰心著: 《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 《冰心全集·第三册》,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年, 第86-87页。

22) 冰心著: 《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 王炳根选编: 《冰心文选·佚文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 第159页。

23) [日]西清子著, 虞萍辑译: 《战后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关心——谢冰心女士的报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第2期, 第126页。

24) 同上。

25) 同上。

的欣喜：“战争结束了，日本全体人民，从侵略的军国主义下，翻了一个身。从几十年被欺瞒，受压制的环境里，抬起了头，睁开了眼睛……”

<sup>26)</sup>

用“官民分裂”的思维模式观照日本并不仅是冰心的态度，而是在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一种常态化和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但这些将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严格区分的老生常谈却忽略了日本发动的二战性质不仅是侵略战争，也是其“民族战争”。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的加藤洋子教授就以《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是选择“战争”》为书名撰写了一本有关日本一战和二战的著作，其中对日本国民如何全力支持“大东亚圣战”有详尽论述。<sup>27)</sup>国内将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区分看待的流行论调实质上就是“官民分裂”思维对上层和贫民进行二元对立式硬性切割的延伸，其对贫民道德、素质和地位的无限拔高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浅薄”、“成熟的幼稚”；将特定人群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标签化、脸谱化也显示出一种复杂而成熟的价值评价体系的缺位。正如冰心翻译纪伯伦《先知》中的一句话：“如同一片树叶，除非得到全树的默许，不能独自变黄。所以那作恶者，若没有你们大家无形中的怂恿，也不会作恶”，<sup>28)</sup>军国主义分子将国家变为战争机器必须倚赖一定的民众心理和性格为基础。一个国家的“官”和“民”并非相互割裂的，而是有一种紧密的对应关系：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首领，“官”来自于“民”；有什么样的首领，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官”统治予“民”。二者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相互交织，很难绝对地说谁决定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暴行和灾难绝不只应由“一小撮”人来负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26) 冰心著：《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27) [日]加藤洋子著：《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是选择“战争”》，东京：朝日出版社，2009年，第250-416页。

28) [黎巴嫩]纪伯伦著，冰心译：《先知》，《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也绝非冰心所说的“七千万日本人中的六千几百万人被极少数人引上了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那么简单。<sup>29)</sup>

令人遗憾的是，在战后中国流行的这种极力为日本人民开脱的论调并未唤醒那些“善良无辜”的日本人民的良心，近三十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之势已经不再局限于民间的右翼势力团体，而是早已跃过民意的中间线而成为大多数日本人民的选择。“慰安妇是商业行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谎言”、“大东亚圣战将亚洲各国从欧美殖民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等种种荒唐的论调得以横行于日本国内即是明证，而日本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则不断发明和炮制出“卢沟桥事件中共计划说”等种种极富想象力的奇谈怪论。右翼势力事实上已在日本政坛、知识界和民间形成了一统江山之势，各个领域的右翼分子已结成稳固的政治同盟，“鹰派话语”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声音。当以撤回“村山谈话”、<sup>30)</sup>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sup>31)</sup>恢复对外宣战权为竞选口号的安倍晋三高票当选首相并三次成功连任（以上三个主张在安倍任内已经或正加速成为现实），之后“新安保法案”在日本国会被强行通过，再到如今右翼盟党凭借压倒性选票完全控制参众两院、扫清了修宪的最后路障，冰心“我屡次听到在恶魔的狂舞中痴狂的日军作为神的叛逆者被日本民众所痛恨”的描述就显得如此苍白无力。<sup>32)</sup>对此解志熙就指出冰心和中国人民的宽恕虽然

29) 冰心著：《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30) “村山讲话”指在1995年8月15日，即二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之时，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发表的谈话。该谈话承认日本曾经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带给相关国家和人民的巨大伤害和痛苦，并对此表示“深切懊悔”和“诚心道歉”。

31) 1947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其第二章第九条的内容为：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32) 冰心著：《对日本妇女的期待》，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出自好意，但却“使日本国民如释重负地放弃了对战争责任的反思”，<sup>33)</sup>“事实的真相是当年参战的并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日本军人，那时的日本其实是‘举国体制’、‘前赴后继’地进行战争的……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信从、盲从着日本军阀和天皇的战争政策，努力地支持着战争……当日本人民在战败之初刚刚开始有所反思之时，他们却意外地发现自己不需要反思，因为他们听说自己作为普通国民对战争并无责任，甚至受害更甚于被侵略的人民，于是他们也就释然于怀了，随后便是重新坦然自若地拜祭起靖国神社，以至于渐渐地连那‘小部分’日本军阀的罪责也忘得一干二净了”。<sup>34)</sup>李玲也认为这种宽恕显得过于“一厢情愿”，<sup>35)</sup>“它显然对日本底层民众‘驯良’、服从品格中与军国主义同谋的一面批判不足”。<sup>36)</sup>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陷其人民于悲惨境地，就将之和中国百姓所遭受的灾难相提并论，并据此得出“日本人民所受的苦，不在我们（中国人民——引者注）以下”，<sup>37)</sup>因此前者同样应该得到同情，勾销日本人民所理应作出的反省、道歉和赔偿，这在法理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抢劫犯私闯民宅实施犯罪，在和屋主的搏斗中二人都身负重伤，并不能因为罪犯的受伤程度和屋主一样重就认为二人所受的伤害是平等的。一个是实施犯罪时遭到自卫还击后的罪有应得，另一个是被侵害的无辜受害；两份灾难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宽恕固然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应该后于加害者真诚彻底的道歉和悔过。这种道歉绝不仅意味着一个形式，而是对于让加害者清楚认识自己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非常重要。当日本朋友对冰心说：“战争真

33) 解志熙著：《冰心佚文校读札记》，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四（上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4) 同上。

35) 李玲著：《冰心创作中母性之爱的复杂性》，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四（下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36) 同上。

37) 冰心著：《我自己走过的路》，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的非常悲伤、心酸，而且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行为。”<sup>38)</sup>冰心却赶忙回答：“您的这种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您没有必要赔礼道歉，说这些的应该是那些指导和煽动战争的人们。”<sup>39)</sup>这样的宽恕就显得过于着急和丧失己方立场了。日本战后的不思悔改确实令中华儿女愤慨痛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在加害一方还未彻底悔过的情况下受害一方主动宽恕所造成的后果。用“高尚”、“宽容”、“大度”来形容这样的宽恕只是受害者的单方解读，加害者却并不这样认为，相反他们会说受害者的谅解和放过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从未犯错。而且如此行为，甚至自己的子孙都难以面对，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就出现了中国“90后”和“00后”一代认为“在学校打坏一扇窗户都要赔，日本二战后却唯独对中国分文未赔，所以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应该不存在”的逻辑推理。正因为宽容和怜悯是珍贵的美德，其更应审慎地施予，莫要对恶的怜悯导向对恶的纵容。

前文说到过冰心对日本的民族情绪在其生命中一以贯之，但可惜的是，看待日本“官民分裂”的思维同样贯穿了冰心的一生，直到耄耋之年，她仍然固守着这样的模式。在80岁所作的《我和小读者》中冰心写道：“那时我才明白，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sup>40)</sup>三年后在《花的云海——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一文中冰心称“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受害者，不但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并且得出日本“人民友好，反对战争”的结论。<sup>41)</sup>可惜冰心对于日本的同情和理解并没有换来相应的反馈，相反日本右翼势力急剧膨胀，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竟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篡改为“进入”。冰心为此撰《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

38) 冰心著：《在世间追求和平与美》，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39) 同上。

40) 冰心著：《我和小读者》，《冰心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41) 冰心著：《花的云海——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冰心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代的心灵》一文，质问其“美化那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驱使千千万万日本人民，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行动”，<sup>42)</sup>回忆说“日本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伤害得家破人亡”，并自称“必须以对日本广大人民的同情来代替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憎恨”，最后以“我信赖我们两国坚持人民友好的接班人！”的感叹句收结全文。<sup>43)</sup>这次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是由日本文部省负责，文部省是司职管辖教育、文化、学术的日本中央省厅，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加文化部，可以看出这种强奸历史的行为已不再是少数右翼分子的叫嚣，而业已成为日本政府的选择；已不再是右翼政客推波助澜助长军国主义气焰，而是政府去主动迎合相当大一部分国民的心理。如果真如冰心所说这次对历史的篡改使得日本人民“群起忿怒”，<sup>44)</sup>一个人民普选投票推出的政府是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找麻烦的。事情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武士刀已锋芒出鞘，且刀刀见血；冰心却仍旧在原有的思维中说话，迷信于“军阀”和“人民”的二元对立，寄希望于被“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蒙蔽的“广大日本人民”。这就不再是无知的同情，而成为了一厢情愿的美化。而如今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借着安倍政权明目张胆的支持和推动，日本右翼势力最后一块闪烁其辞的历史遮羞布（例如称对于日本的二战历史认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多元的解读云云）也已被扯下，对二战历史的“去侵略化”和“义战化”全面展开。在2015年最新一轮的历史教科书审定中，慰安妇的史实不仅被大幅删减，甚至“慰安妇”一词在多家出版社的课本的中都直接消失；课本中对日本二战“自保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描述更加肆无忌惮，极力将安倍晋三口中所谓“日本打了一场正确的战争”的二战观灌输进下一代的头脑中。这之后发生的种种倘若冰心泉下有知，不知她又将作何感想？事实已经再清楚不过，“日本人民”

42) 冰心著：《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冰心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43) 同上，第137页。

44) 同上，第136页。

并没有冰心所想象的那么善良。现今日本政府的嚣张言行若追根溯源，固然和二战之后中国大陆政权格局突变，美国转而扶植日本，对其国内的右翼势力由打压转为默许有深度关联；也和战后国共争斗中日本右翼战犯“渔翁得利”、被轻判甚至遭包庇，日本利用国共矛盾逃避赔偿有关；但国人对于“日本人民”这一概念的“美学想象”和基于这种想象的一系列行为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冰心所译的纪伯伦诗歌《先知》中有这样一句：“你们不能把至公与不公，至善与不善分开；/因为他们一齐站在太阳面前，如同织在一起的黑线和白线，/黑线断了的时候，织工就要视察整块的布，也要察看那机杼”，<sup>45)</sup>正如二战的侵略暴行需要整个日本民族来承担责任，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主流化、国家化也离不开日本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 四.文化成因的追溯

冰心的慈言善行对比日本的无情“翻供”引起了笔者深深的思考，但在广泛查阅资料后一个更令人深思的史实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官民分裂”的观点并非冰心的一家之言，而是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共鸣。因为同情战后的日本人民，冰心在1946年底的《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一文中主张对日本“要‘以德报怨’用仁爱柔和的心，携带着全世界的弟兄，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sup>46)</sup>而在当时提出类似论调的还包括国民党党魁蒋介石，蒋氏的“以德报怨”之说甚至还早于冰心之文一年零四个月。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演讲中，蒋氏说道：“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

45) [黎巴嫩]纪伯伦著，冰心译：《先知》，《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46) 冰心著：《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篇演讲并非由国民党文胆代笔，而是由蒋氏亲自撰写并宣播，显示了蒋氏的极端重视；因此有理由相信，文中的观点反映了蒋氏的真实思想。虽然这篇演讲中并无“以德报怨”之字样，但通篇充斥着“以德报怨”的思想，这也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蒋氏该演讲时以“以德报怨”为标题的原因。蒋氏对于这个代拟的题目并无异见，在之后还默许并多次引用，例如在1946年指示国民政府驻日代表朱世民时就以“以德报怨”来代指自己之前的这次演讲，显示出相当的认同。但以德服人、乐善好施的儒家仁爱思想和崇尚勇武、臣服强者的武士道精神本就格格不入，以此来对待一群只讲胜负、不问是非的人无异于对牛弹琴，结果换来的是对方“以怨报德”，全然否认曾经造成的伤害（“日本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是后者邀请日本到国内的”等等），并自认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甚至有恩于受害者（“日本发动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圣战是将其从欧美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等等），后来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令先前受害者高尚的宽恕就显得如同一出自欺的独角戏。对他者的蓄意圣化沦为了自我的高尚扮演，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高尚”并不被加害一方所承认。不可否认，人的心理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平衡。形而上的以德报怨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美德，但如果这样的应对成为了一种惯常模式，极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当受到真正的关心和关爱时，却往往以怨报德，“文革”中对诸多国军抗日将卒及其眷属的残酷迫害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官民分裂”的“分开看”的思维似乎只是专属于

看待外国人的，国人含辛茹苦地养育日本遗孤，因为他们是截然不同于侵略者的，是“无辜”的；但对于隶属同胞的“黑五类”子女则无情批斗，甚至将其逼至家破人亡。这实际是一种恶性的、自虐的双重标准。这样的双重标准还直接体现在战后对于战犯的审判上，例如同属日军艳谍，身为中国籍的川岛芳子最终被执行枪决，而李香兰同样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证明了其拥有日本籍而被改判无罪、当庭释放。

“官民分裂”的思维模式似乎是中华民族国民性中的一部分，解志熙在研读了冰心的佚文后就感慨道：“以前，我还以为把日本人区分成无辜的人民和有罪的军阀，只是中国共产党本其阶级分析的观点所做出的区别对待之道，读了冰心的谈话才明白这实际上是历届中国政权和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态度。”<sup>47)</sup>笔者在看到蒋氏的演讲之前也曾怀疑这种“官民分裂”的思维模式为近代左翼政党所专有，但经过分析之后得出这种思维模式是无法从马列主义思想中“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这一原则来找到源头的。因为按这种溯源的方式就无法解释共和国的“师傅”——同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出兵东北、摧毁关东军后，将近六十万东北日俘押往西伯利亚，强迫其在冰天雪地的劳工营做了三至四年的奴工，这群俘虏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奴役折磨至死。苏联并不因这些士兵是“日本军阀”愚弄下的“日本人民”而有任何怜悯；相反当时宗奉三民主义的国民政府在正规部队军粮供应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仍予以日军俘虏衣食无忧的生活。1945年中国将东北日俘由葫芦岛遣返回国，并在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协助之下，将约一百五十万的东北日侨遣返日本。<sup>48)</sup>联系到冰心曾用《圣经》经文“愿上帝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

47) 解志熙著：《冰心佚文校读札记》，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四（上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48) 除了对日侨的照顾，优待日军战俘和战犯的方式也在之后继续出现。1949年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接收和关押日本战犯1109名。管理所要求管理人员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等污辱行为。管理所给战犯安排了营养师，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每餐鸡鸭鱼肉任吃，在“三年困难时期”伙食标准不变。管理所里设立了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护士，定期为战犯们检

的，他们并不知道”（《路加福音》23章34节）来为日本人民开脱，<sup>49)</sup>那么这种“官民分裂”的思维是否来自基督教的信条呢？如果真是如此，就无法解释主流人群信仰基督教的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近三十万平民的伤亡。如果美国认为日本人民是善良而无辜的，其完全可以单单去轰炸日本军部所在地。可以看到，“官民分裂”既不是冰心的专属，也并非源自马列主义，更和宗教信仰无关。既然这种思维模式的源起并非“外在”，那么其是否为“内在”呢？对于日本人民和日本军阀的分而视之表面上是在付出对他国民众的关爱，但这样的奉献背后深藏不露的是一种施者的满足，对“他”的付出最终还是要回到对“我”的确认。这就事实上构成了动机的无意识分裂，而分裂的动机引发了分裂的思维，分裂的思维再进一步导致了分裂的行为。国人在战后对于善待日本所构想的一系列理据都是要确保对他者的施予是有意义的，这样的施予又和中国历史上自封“天朝上国”、惯对“蛮夷”施恩的的民族“面子”心理紧密相连。这种“面子”心理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

---

查治疗身体，有专人帮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理发，并建有日式泡澡的澡堂。允许战犯们与日本的亲属进行通信、会见，有的战犯甚至可以定期定点出去和妻子过夫妻生活，生下的孩子由中国政府负责供养；管理所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战犯闲暇时可以打网球（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70页。）。对于战犯的处置，相比于国民政府军事法庭自1945年12月中旬至1947年底共计审判日本战犯2435人，其中判处死刑149人，实际执行14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1956年6月至7月分别在沈阳、太原对关押1109名战犯中的45名进行公开审判；对其实行从宽处理，分别判处了八年至二十年有期徒刑，其中有重大疾病的战犯判刑后第二天即被释放，其余战犯被发放免于起诉决定书，并于当日释放，之后遣返回日本。而在韩战战场上，参战双方对待敌方俘虏之“中外有别”的剧情再次上演。

49) 冰心在作品中写道：“日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战犯公审的内容，都异常诧异。他们的确不知道日军会在外国如此作恶。我在此地（指基督教青年会——引者注）正好说一句，像耶稣所说的：愿上帝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冰心著：《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我自己走过的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2页。）

统治者热衷于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慷慨赏赐，以换取“万国来朝”的“天下之中”优越感。如果说在汉唐盛世这样的慷慨还是符合国情和实际的（而且汉唐盛世的“慷慨”不少都是在国威慑服之后），在其它一些不那么强盛的朝代，如果还硬要白送白给就无异于“打肿脸充胖子”了，例如明朝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为目的的郑和下西洋巡航最后就导致国库亏空，其对于周边藩属国纳贡的丰厚回赏形成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明实录》）的局面，令财政不堪重负。这样的行为多少包含着一种心态：送出礼物的丰厚程度和从收礼者处得到的敬仰成正比。但当中国出于为日本人民的负担考虑而主动放弃巨额战争索赔时，换来的却是背信和轻蔑。这种“官民分裂”思维模式的应用也不止于日本，它像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一样笼罩着国人对于古今中外各种历史和现象的诠释与判断。例如因为“官民分裂”的模式可以很好地配合古典权力观中认为权力是压迫/反抗、奴役/被奴役、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二元对立关系的观点，当今在大陆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不少都采用这样的二元架构，强调皇权对百姓的欺压和剥削。但这种严格清晰的二元划分却带有浓厚的推理预设色彩，并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实。而且更应警惕的是，“官民分裂”的模式不仅被应用于对他者的关照，也体现在对自我的审视，这在某些文革史的叙述中表现得愈加淋漓尽致。明明是全民参与的政治狂欢，却要将其截然分为“一小撮野心家”和“广大有良知的民众”两类人，仿佛十年浩劫就是一小撮人造成的，拒绝对历史的反思和责任的担当。这样的说辞和冰心将日本人视为“一小撮邪恶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善良的日本人民”如出一辙，不过是用新瓶装的旧酒罢了。其实冰心应该也遇到过反思“官民分裂”的二元思维的机会，在她1924年所作的《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一文中，冰心这样引用一位美国作者在《北京的沙尘》一书中对当时中国的讥嘲：“上而国政，下而洋车夫倚外人势力欺压国人，巡警怕事，袖手他顾……都在被人讥笑之列”；<sup>50</sup>显然这本书的作者是将当时中国的落后

当作一个整体去观察，那些操控混乱国政的领导人、底层的洋车夫、普通的巡警均反映出类似的本质。在这本书第四章“种族的对比”中，这位美国作者还询问了一位在日本游历的英国人喜不喜欢日本，后者的回答对比了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外国人的不同态度：“我不很喜欢日本人，他们与中国人比不了。总起来说，日本人是常以待我们，中国人却以超人待我们 (In Japan they treat you as a equal, in China they treat you as a superior.)”。<sup>51)</sup>看来这种对于外国人的“特殊优待”不仅仅是针对日本，而是面向所有的外邦，只是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的伤害最深，所以得到的“慷慨”也相应更多。而且引文的回答也说明了中日国民的价值观差异，虽然同处亚洲文化圈，日本人对待西人的态度就比中国人要显得不卑不亢。

## 五. 结语

冰心“官民分裂”的思维模式所依恃的是一种看待人性的理想化视角，其中的贫民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主体，他们无所不能而又一无所能；其中的上层也天然地带着“原罪”，为贫民的一切苦难承担罪责；其应用在冰心的对日态度上，愈发表现出对客观事实和理性轨道的偏离。这样的思维和历史上的民族“面子”心理深度勾连，构成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并以种种看似高贵正义的理据来包装潜意识中的悖谬逻辑。当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来关照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人们就很容易被外表“正确”的逻辑洗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种思维模式在现实中被反复运用后，就极易逐渐强化和固化为思维定势。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可

50) 冰心著：《介绍一本书——〈北京的沙尘〉》，《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

51) 同上，第156页。

能，在理想化的逻辑推导和简单化的历史还原中，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都被消解和重述，伤痛的山河之血被洗白为温情的童话之梦。走进酷烈残伤过去，在人性之镜前自省，我们不能不感到历史深处的忧患；历史和当下连结，忧患愈加深沉。此时此刻，历史的鬼魅正以一种隐匿的方式重置和聚合着回生的潜能。只有学会掌握一种全面而非分裂、理性而非片面、整体而非碎片的思维，理性地对待他国，客观地关照历史，清醒地认知自我，人在关键时刻才能做出成熟的抉择。也只有无论事实的真相是多么的冷酷刺痛都能毫无保留地去拥抱和接受，那个曾经在冰心笔下纠缠不清的逻辑怪圈才能了然清晰，那些历史的伤痛和走过的弯路才能冲破轮回的宿命，那些曾经承受战争和苦难才能止步于重演的悲剧。就让这一切真正地化为我们直面史实的勇气，成为这个时代东亚和平繁荣的助力。

## 参考文献

- 冰心著：《分》，《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王炳根著：《甲午战争》编者注，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 舒乙著：《冰心的豪恣大悲》，《意林》，2006年第20期。
- 冰心著：《关于女人·我的奶娘》，《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王炳根著：《永远的爱心·冰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 冰心著：《对日本民众没有怨恨》，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 冰心著：《冰心女士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冰心著：《在世间追求和平与美》，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 冰心著：《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日]西清子著，虞萍辑译：《战后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关心——谢冰心女士的报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 冰心著：《给日本学生的一封信》，《冰心全集·第三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日]加藤洋子著：《即便如此，日本人还是选择“战争”》，东京：朝日出版社，2009年。
- [黎巴嫩]纪伯伦著，冰心译：《先知》，《冰心全集·第九册》，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冰心著：《对日本妇女的期待》，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解志熙著：《冰心佚文校读札记》，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四（上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

李玲著：《冰心创作中母性之爱的复杂性》，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四（下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

冰心著：《我自己走过的路》，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冰心著：《我和小读者》，《冰心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花的云海 友谊的轻舟——我为什么写〈樱花赞〉》，《冰心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冰心著：《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冰心全集·第六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冰心著：《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我自己走过的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冰心著：《介绍一本书——〈北京的沙尘〉》，《冰心全集·第二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 Abstract

### Concern and Danger in Deep History : Analysis On Bing Xin's Attitude towards Japan

Li Zhuora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Japan is a crucial country which exerted huge influ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Bing Xin's attitude towards Japan, trying to reveal a sort of mindset with which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China's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elites view Japan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case. In Bing Xin's works in earlier stage, the line of development in storie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 show a distinct dichotomy,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Power and Powerless" dichotomic thinking mode. When Bing Xin uses this kind of thinking mode to look upon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she falls into the logic trap unconsciously, which leads to deviative or even absurd attitude. Only learning to own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rational and integral thinking, can the truth of history be revealed and will the recurrence of historical suffering be avoided.

Key words : Bing Xin, Literary Creation, "Power and Powerless",  
Attitude towards Japan, History

투 고 일 : 2019. 1. 10. / 심 사 일 : 2019. 1. 15. ~ 2019.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9. 2. 20.